

谢
宏◎著

他们与她们

他们与她们，都是有故事的人，
有些是名人大家，可载入史册，有些则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者。
他们与她们，有的还在与我同行，有的已与我擦肩而过。
他们与她们，已是我世界的一部分。

我相信，写下他们与她们，即固化了时间，
抵抗了遗忘，留住了某段时光。

…
宏◎著

他们与她们

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他们与她们/谢宏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
2013. 8

ISBN 978-7-5473-0602-4

I. ①他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60873 号

他们与她们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021-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18 千

印 张: 6.5

版 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0602-4

定 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: 52069798

自序

我曾有个想法，就是写下一一些人，我所遇见的，给过我感触的，有意思的，或有趣的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与我生命有过交集，在记忆中留下过光亮，会令我怀念起往昔时光的人。

我开始动笔写的时候，以为是容易的小事，但越写却越困难，我发觉写人是最困难的。我想写一些我十分熟悉，认为值得写，也应该写的人，但真正动笔时，又感觉难度大，心绪浮动，又欲说无词。我只能解释为，大概是还没到最好的机缘，我唯有继续等待。

写人物随笔，看似基于自己的观感，但越到后来越发觉，这不仅是观感问题，可能与机缘巧合有关。甚至完成之后，我也发现自己笔下的“他们与她们”，与真实的可能是有距离的。如今再看，更是恍如隔世。“他们与她们”，可能已变成了作品里的主角了。这常令我感到惊讶，又有发现新大陆的欣喜。

写人物太难了。事实也说明的确这样。我想写的人物，何止百十人，可如今已完成的，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的人，还不到半百，但至少我的努力有了一些成果，也让我有了一点欣慰感。

在这本小册子里的，他们与她们，有些是我的至爱亲朋，有些是旅途中偶遇的陌生人；有些是名人大家，可载入史册，有些则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者。故国他乡，海角天涯，他们与她们，有的还在与我同行，有的与我擦肩而过，有的已经远走高飞，只留给我消逝的背影。但我知道，他们与她们，已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。

我相信，写下他们与她们，即固化了时间，抵抗了遗忘，留住了某段时光。

2013. 5. 6 于新西兰

目 录

自序

格非教授 / 1

又见李洱 / 5

何馆长或何教授 / 9

作家巴桥 / 14

诗意的梦游人 / 21

温远辉先生 / 27

一个诗人 / 30

小八 / 36

钱老师 / 41

小丫头 / 46

飘来荡去 / 50

是个人物 / 56

朗诵者 / 64

爱情故事 / 70

女同学 / 75

性情中人 / 82

女作家央歌儿 / 88

忘年交 / 93

才子陈希我 / 97

书生意气 / 100

书虫邱华栋 / 103

依然孟浪 / 108

老文青 / 111

杨泥大姐 / 116

阿宝 / 120

凤凰亮翅 / 124

苏菲 / 129

弟弟 / 134

巢之梦 / 139

翅膀 / 141

给父亲过生日 / 143

撒娇 / 146

观礼记 / 148

- 房东 C 太太 / 152
- 小玩家 / 155
- 悬空人 / 158
- 活招牌 / 162
- 毛利司机理查 / 167
- 一个蒂阿瑙画家 / 171
- 旅伴 / 174
- Kiwi 丹尼 / 177
- 说说顾城,也说说自己 / 180
- 探访顾城的旧居 / 185
- 丹妮忆顾城 / 192

格非教授

一提到格非，大家大概都会将他放在作家的行列。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正当老师呢。说他是教授或作家都没错，他是个学者型的作家。我在华东师大读书那会，常去河东中文系的宿舍串门，和我混在一起的，大多是八五级中文系的学生，当中有许多是我的好朋友，而格非是他们的辅导员，因而也会遇见他，他正处于精力旺盛、意气风发的年纪，写小说也已声名鹊起，听说张艺谋曾想将他的一个小说改编成电影，虽然最后没成事，但我想，这个事件至少给他、给我们这些“文青”，都有极大的刺激和鼓舞，因为当时，张艺谋导演的《红高粱》正红遍国内外。

当时我虽读经济系，却和夏雨诗社的诗人混，用诗歌描绘我们的白日梦，但说内心话，我与那些走红的校园男诗人有点“隔”，总觉得他们过于邈邈或癫狂，我反而比较欣赏写散文或小说的，觉得他们斯文得体，有如谦谦君子，不像诗人那样，一惊一乍的，显得小气。但当时我几乎不读小说，偶尔听格非和

他的学生胡侃,我也只有静静听的份。

毕业离开师大后,我就没了他的消息。听他的学生说,他还在师大做老师。直到我开始写小说,我才在翻阅杂志时看他的小说,那时候他已红得发紫。后来我们再次见面,是在1995年的4月,《特区文学》杂志社搞笔会,请了格非、苏童、余华等作家来深圳,而我作为市里的作家,也受邀参加座谈会。

其间我们作过简单的交谈,还送了一本我的诗集《光阴的故事》给他。我们互留了通讯方式,但之后却没联络。等到我要出小说集《温柔与狂暴》的时候,我想请他写序,但心里有点忐忑,才打电话征询王为松。王为松说应该没问题的。还给我格非在北京的电话,当时他正在岳父家度假。

我给格非打电话,说了这个意思。没想到他很爽快地答应了,还很快就写好寄来了,对我的作品,他有弹有赞,让我受益匪浅。而后,我们偶有电话联络,加上我每年都有出差机会,就常绕道拐去上海,住在学校的招待所,走在林荫大道,乘机做个怀旧的梦。小住的日子,我会请格非吃个饭,听他侃侃写作,他口才出众,真是做老师的料。那段时间,他在读博士,写得少了,但读了许多书。

大概1999年前吧,我去上海时,又和他见了一面。饭局上,问起他的写作。他说动了笔,写了几万字就停下了,一直没继续下去。他说起他可能要离开上海。当时我有点惊讶,

但过后没在意,心想他要走的话,大概会去北京的。我这样想的理由,一是他夫人是北京人,二来嘛,也只有北京这城市,最适合他这段位的作家。果真,后来一联络,他真的是在北京接我的电话了,谈到自己的状态,他说很享受教师这份职业,可读可写可授业,他说这份工作比较适合自己。

一晃又五六年过去了。我的工作岗位也调整了几处,没了出差的机会,我几乎没再出去走动了。2004年4月,我从单位辞职后,只待在家里写东西,也少出外跑动。满满地写了一年,有天看报,突然看到一则消息,说格非蛰伏十年,写就了一部接近经典的长篇《人面桃花》,于是赶紧跑书店买回一本细细欣赏。

之后,又在《南方都市报》上看到消息,他获得华语传媒文学大奖,照片上的他,满脸笑容,但头发也白了许多。我突然感慨起来,发觉自己也该出去走走了,于是才有了2005年5月的京沪远游。

这次我们是在“万圣书园”见面的。那离我暂住的北大不远,离他任教的清华大学也近。那天下雨,诗友刘晓芳驾车和我一起去的。格非一早就到了,坐在楼上咖啡馆的中央。我发觉他更壮实了,头上的白发多了,但还是精力充沛。

格非给我的感觉,一直有领导的风度,这会也真是做领导了,他现在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副主任。我们点了饮料,边喝边聊,话题大多集中在学校方面,原因是我这人嘴拙,起不了

话题,加上刘晓芳博士毕业,正四处找工作的学校,格非就给了他不少的意见。

后来谈到写作的问题,格非针对我的状态,也给出了意见,他说我出道算早的,也有基础,但老这么晃不行,要么找人想办法,要么干脆再找个工作,在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,将现在所拥有的,统统放弃,闷头写它个十年再闹红,这话将我说得浑身冒汗。

后来想想我又释然了,他对我说这样的话,一来他是我敢于求助的师兄(另一个是李洱),所以我愿听实话,但我是个脸皮薄的人,要我主动求人,大概是比较难办的。二来我们的处境不同,想问题的出发点也不同,但我知道,他的意见很重要。我应该重新厘定一个新的出发点。

离开的时候,我们三个人都争着付钱结账,都拿了钱出来,服务员先要我递过去的100元钱,但后来又说要零钱,我正低头在钱包里找,他们其中一个已将账结了,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晓芳还是格非。我的那100元又回到了茶几上,最后回到了我的钱包里。离开前,我们三个人合了照,就在咖啡馆的门口。下楼一看,雨越发下大了。我们钻进晓芳的车子,将格非送回寓所。

回深圳后,我将照片冲出来,一看,我和晓芳的脸,都绷得紧,太严肃,格非站在中间,神态很放松,显出自信的笑容来。

又见李洱

李洱喊我的名字时，我正在会所前的空地徘徊。听见喊声，我抬头望过去，他正朝我走过来，十几年未见，他容颜未改，还是那么瘦，没有挺起的肚臍，依旧一副我中文人的模样。

我笑着握住他伸过来的手，说他还和学校那会差不多啊。他嘿嘿地笑，一边和我搭话，一边引我往会所里走。这时是2005年5月15日的午饭时间，阳光正好，晒得人懒洋洋的。

说起来，李洱是师兄，高我两届，但我们不同系。他读中文系，我读经济系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在华东师大上学那会，文学和经济同样热。那时我对文学万分迷狂，很崇拜中文系的人，不但和夏雨诗社的人混在一起，整天捣鼓诗歌，还老往中文系的宿舍里窜，遇见许多癫狂邈邈的“文人雅士”，有关他们的奇闻逸事，早在校园传遍。

但显然李洱不在此列，他是我喜欢的另一类文人，文质彬彬，斯文得体。那时他写得一手好散文，在搞一本叫《散花》的

油印杂志，上面发过中文系几个才子的一组同题散文，叫《林荫道上的咖啡馆》。恕我愚笨，直到现在，都没搞懂他们那组散文的寓意。

我们在不同的文学社团，但偶尔一起参加活动。记得有次去上海的“大世界”参加文学活动，晚上一起坐车回来，我站在车上，手吊在扶手上，一路听他说些笑话，说了些什么，我不记得，总之蛮好玩的。后来他毕业离校，走后就杳无音信了。

我毕业后回深圳，写了近十年的诗歌。到90年代中期，我的写作从诗歌转向小说。小说写完便跑图书馆，翻阅文学杂志，找地址四处投稿。我注意到一个叫李洱的作家，频频出现在各家杂志上，但当时也没太留意，也没看过他的作品，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红，到处都是有关他作品的评论。

后来我翻阅到《作家》杂志，有一则他的简介，还配了照片，我这才知道，李洱就是荣飞呢！我记不清楚了，我是从朱彦鹏大哥还是从格非那里要到了他的电话号码。我打过去，他在郑州家里，显得挺惊讶的，连说真没想到呢。

我们就这么联系上了，但一直没能见面，在电话里，我们聊了很多，谈过他的《花腔》和《石榴树上结樱桃》两本书，似乎前者的成就比后者高。他问过我的看法，我也实话实说，我喜欢后者，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。我常说，你来深圳玩吧，我请你吃饭；他也笑着说，我去郑州玩的话，他请我吃饭。这话说了几年，没想到，我们却是在北京见面，才有了个两人的

饭局。

我们往会所走，遇见一个女服务员，李洱逗她说，这小妹妹很好的，我们就在这吃吧。那小妹妹抿嘴一笑，领我们往大厅走。到了门口，望一眼，李洱又说，要不我们吃烤鸭吧？他说过又带我出来，横过马路，往对面一家烤鸭店走。

进去一看，人多声杂，根本没法说话，我们又倒回那家会所去，进大厅挑位子坐下。我对李洱说，你点菜，我请客。李洱只问我喜欢吃什么。我说我对吃的都采取通吃的态度。李洱说他还比较讲究吃的，于是点了许多菜，边吃边聊些琐事。吃好，他说晚上要回趟郑州，得回去收拾东西。

我喊服务员过来结账。但李洱坚持说他是东道主，这饭他请，抢着结了账。之后，我们还坐在大堂的沙发上，由那个可爱的小妹妹给我们照了个合影。出了会所，李洱让我到他家坐一会。我注意到他心事重重的，有点担心会打扰他。李洱说，那半个小时吧。

在他宽敞明亮的家里，我们坐在阳台聊天。我注意到阳台的壁柜上，摆了些他夫人的奖座，我就问他的呢。他说要是摆出来，他不是有病吗？我说他太谦虚了。他只是笑。我问他干吗心事重重的。他说自己是个懒散的人，但总有许多琐事要做。谈到写作，我说挺羡慕他的成绩的。

不过，他却说挺羡慕我这种状态的，爱写就写，不想写就不写。我有点惊讶，说你说笑吧？李洱解释说欠了许多文

债。我笑说这不挺好的嘛。李洱苦笑一下,说写得太快的话,对得起编辑,却对不起读者,反过来也一样。他话不多,我也是,有时候我们就不说话,都发呆,想起就搭一句话。后来他送我下楼,我出来一看表,都过了一个小时了。

从北京回来,我将照片冲出来,一看,李洱和我,都显得严肃,都心事重重的。后来,我们通了个电话,他正在修改一篇小说,听他的语气,有点烦躁。我打趣说,烦什么啊,作品能发在那么好的杂志上。他却不以为然,说我不明白。我说我想烦都没得烦呢。他反问我,一个月能写出两个中篇、两个短篇吗?我说那我不行。他说搞“联网四重奏”的时候,他就干过,那太难了。

想想也是,他是这么个认真的人,要想敷衍,肯定不可能。我想这就是他苦恼的原因吧。后来聊到我的作品,我让他挑毛病,他说我的东西太平,不够深刻,没有痛感。我辩解说,我看世界的眼光是平和的。他说小说不该这样。他以前给我的书《貌合神离》写过书评,写得十分机智好玩,还不失宽容大度,对我笔下留情,让人看了有份温暖感。

这次北京见面,距我们上次在学校的见面,中间相隔了大约15年。时光飞逝,他现在已是著名作家了,但还保留着那谦谦君子的风度,和他相处,让我毫无见外的惶恐。而我呢,白的头发比他多,肚子也比他挺,学问却没见长多少。

何馆长或何教授

我们现在还叫他馆长。他是上海奉贤人。馆长这个名字的来由,要追溯到大学时代了。我们都是经济系的,住一个寝室,先是八个人住,后来走了一个,剩下我们七个。他是我们的室长,当时我们想将寝室叫得雅点,就管它叫公馆,所以他就成了馆长。大学时代我们一个寝室的室友都相处得不错,也发生了不少趣事。

何馆长刚进学校不久,就表现出了经商的天分,课余时间不断倒腾些东西叫卖,赚点零花钱。我记得有一次,他搞了一批红色的运动衣来卖。没几天,我的妈呀,上课或者去打饭,走在学校的路上,就见到到处都是他卖出的红色运动衣。

我们都开玩笑说,看看,这都是我们何馆长的手笔。他听了大笑不已,有点骄傲地说,遍地开花啊。多年后再说起,大家还记忆犹新,会大笑一番,特别是老唐,也买过一件的,当然是打过折的。

何馆长除了经商有天分外,体育方面也表现突出,他是大